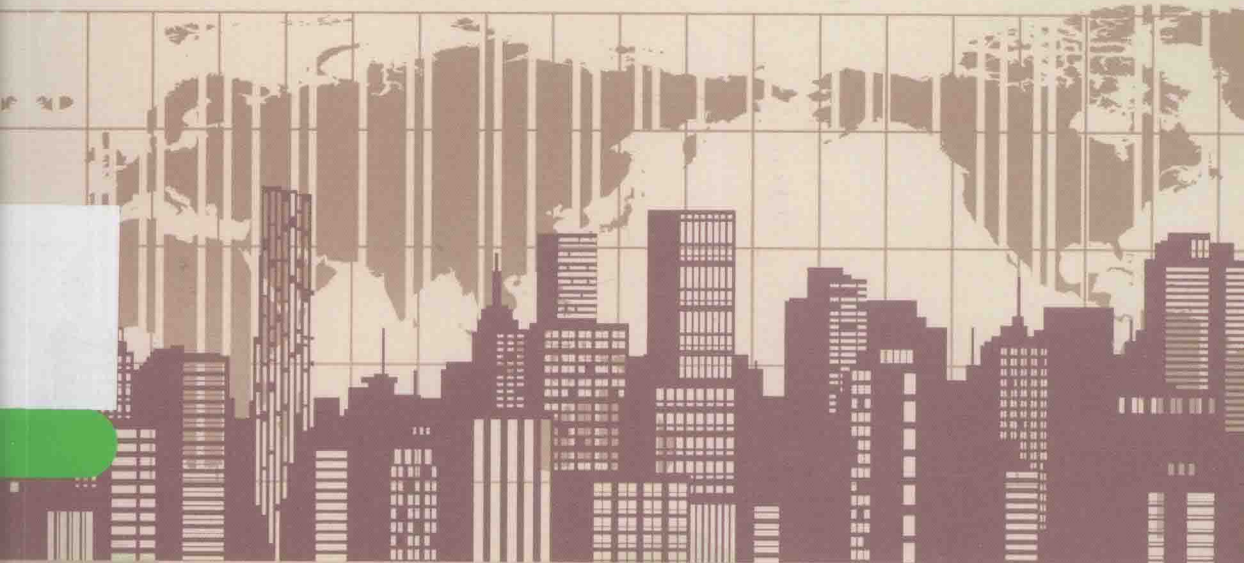


The BRICS and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Order

金砖国家及其超越

新兴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

【丹麦】李彤 主编
林宏宇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金砖国家及其超越

新兴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

The BRICS and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Order

【丹麦】李彤 主编
林宏宇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 Li Xing, September 2010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BRICS and Beyond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published in 2015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砖国家及其超越：新兴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 / (丹)
李彤主编；林宏宇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6

书名原文：The BRICS and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Order

ISBN 978-7-5012-4934-3

I. ①金… II. ①李… ②林… III. ①世界经济政治学—研究
IV. ①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9810号

图字：01-2015-1979号

责任编辑
特邀编辑
责任出版

贾丽红
胡孝文
赵 玥

书 名

金砖国家及其超越：新兴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
Jinzhuanguojia Jiqi Chaoyue: Xinxing Shijie Zhixu De Guoji Zhengzhi
Jingjixue Jiedu

主 编
译 者

[丹麦] 李 彤
林宏宇 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14½印张

字 数

230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934-3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与中国(代序)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校长)

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参与国际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主体所遵循的规则、保障这些规则实施所需要的机制,以及这些规则和机制所决定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内容来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国际行为主体的规则和机制,二是这些规则和机制所决定的、或者说是反映出来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具体的、表面的,后者是抽象的、实质性的。研究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既要了解国际规则的具体内容,更要分析规则背后的本质。

一、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本质

(一)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实力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之后,这些规则和机制虽然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但总体上是原来秩序的延续,本质没变,仍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二战前的资本主义国际生产体系是以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殖民地附属国主要生产并向宗主国提供工业生产所需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宗主国则利用这些初级产品加工成制成品,并把殖民地作为销售市场,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使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依附于宗

主国。

二战后，各国的产业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国际分工体系明显变化。首先，从国际分工的广度来看，已经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分工，发展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分工。其次，从国际分工的深度来看，已经由不同产业间的分工发展到每个产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之间、同一零部件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第三，国际分工的媒介由以国际商品交换为主渠道，发展到生产资本的国际流动及区域经济集团的内部政策协调等多种渠道。特别是跨国公司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其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供产销、资金调拨、技术转让等生产经营的主要环节，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也就表现为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必然对南北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影响。首先，由于国际分工主要发生在经济技术水平相近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其中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的领域相对狭小，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体系之外。其次，从当前南北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来看，基本保持了农业与工业之间、采掘业与加工业之间垂直分工的格局。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虽然参加了制造业内部的分工，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优势地位，高新技术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新型服务业，基本上为它们所垄断和控制。即便在传统上南方占优势的第一产业，由于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少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占据强大优势，如粮食、蛋乳制品、畜禽肉类等。总之，在南北国际分工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生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仅使南北双方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极不均衡，还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单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固化，使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更加困难。

2. 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南北双方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也截然不同。

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导致不对称的贸易依存关系。由于科技水平的差距大，南北国家之间的交换主要是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之间、物质产品与服务产品之间的交换。在商品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出口

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存度达3/4至4/5,而发达国家出口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依存度仅为1/5至1/4。在服务贸易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既是主要的进口国,又是主要的出口国;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进口国,即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出口。这种不对称的依存关系,使发达国家在国际交换中往往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

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二战后,在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协调下,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逐步削减,贸易自由化有了快速发展。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后,以非关税壁垒为特点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的贸易政策以《1988年贸易和竞争综合法案》的形成和实施为标志,出现了由全球多边主义向双边互惠主义、由倡导“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公然包含“购买国货条款”,规定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竞争力的下滑,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愈加明显,所保护的不再限于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扩展到了电子、新能源等领域。欧盟还以保护主义为手段,借以打开其他国家市场,2010年11月出台的“贸易新战略”宣称将在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救济工具之外创设新的政策工具,对“拒不向欧盟企业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国家实施限制,迫使对方“对等开放”。

3. 发达国家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体系。二战后,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FDI)迅速增长。跨国公司凭借其在生产、技术、经营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界、跨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既给东道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旧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构成了重要制约。

首先,不平衡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达国家既是FDI的主要投资者,又是主要吸纳者,而最需要外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却相对不多。201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排名中,美、日、英、法四国依旧牢牢地占据着前四位,占世界FDI中的近60%。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这种不平衡的国际投资格局实际上把相当大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利用全球化机遇之外。

其次，不合理的国际投资结构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发展中国家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不仅仅是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因此，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往往与发展中国家引资的目标发生偏差或矛盾。为了避免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技术转让，特别是核心技术的转让。而且，跨国公司还把高污染、高环保成本的产品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跨国公司的这些行为必然与发展中国家引资的目的相悖，制约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跨国公司的垄断倾向和不公平竞争行为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谋求垄断地位和垄断特权以攫取垄断利润，是跨国公司的天性。他们凭借在资本、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力图垄断一些产品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以谋取高额垄断利润。另外，跨国公司还采取“高进低出”（高估进口设备和零部件的价格、技术转让费和资金使用成本，低估产品的出口价格）的方法来转移利润，使发展中国家蒙受税收损失。

4. 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十分有限，经常被动承受货币和金融冲击，甚至不得不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埋单”，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其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得以凭借货币发行特权，从全世界获得“铸币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世界贸易的2/3以美元结算，各国外汇储备的2/3为美元资产。在美元霸权下，世界其他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美国，才使得美国人能够借钱消费“寅吃卯粮”，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财政与贸易“双赤字”。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从属地位，使它们既无力影响汇率波动，又难以防范汇率风险，处境十分被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为缓解危机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国际市场资金泛滥，大量资金涌向发展中国家。美国随后采取的“退出政策”又引发资金回流，资金“大进大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剧烈冲击。

其二,国际金融组织中,“以钱换权”的决策机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的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两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组织,但各成员国在决策中的权力很不平等。按照章程规定,成员国参与决策的投票权不是一国一票制,而是根据各自向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认缴的份额和股本多少而定。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强、认缴的份额多,投票权就多,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就大。各成员国认缴的份额和股本的数量,还决定了它们在获取贷款和分配特别提款权方面的优先权力。国际金融机构这种“以钱换权”的决策机制,维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意志和利益重视不够甚至不予考虑。因此,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有效地保障其代表性和发言权。

(二) 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本质

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根本特征是,个别超级大国和少数富国、强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处于“国弱言轻”的从属地位,长期被排斥在重大国际事务之外。二战前,国际政治旧秩序直接以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虽然崩溃,但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雅尔塔协定》确定了两极体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分别组织了“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政治集团进行对抗和“冷战”,从而使国际局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两极体制瓦解后,整个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国际政治旧秩序并没有消失,西方大国并未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逻辑。

1. 美国竭力维持其霸权地位。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终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大大削弱,已经无力与美国争霸,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力图独霸世界,把自己的价值观、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世界各国,把整个世界变成美国式的世界。美国的做法包括:

其一,强化军事力量,推行“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提出20世纪90年代第一个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预算后,美国防务预算不断增加,武器技术和军事实力领先优势不断强化。在追求绝对超强军事实力的同时,美国竭力推

行“单边主义”。在“9·11”事件以前，美国退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又退出反导条约，不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绝地雷公约，并以反恐为由，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先发制人”战略。由于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在国际社会饱受非议，小布什第二任期后才在这方面有所调整，开始强调与其他大国的合作。

其二，构筑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制。美国为推行霸权主义，加紧构筑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安全体制，使得每个地区的大国和国家集团对该地区的秩序承担主要责任，但又不脱离美国的控制。在欧洲，美国直接控制和强化北约的作用。在东亚，美国逐步构建完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双边同盟体系，通过《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泰共同安全法》等一系列双边安全条约，确定了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和义务，巩固了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的主导地位。

第三，推行新干涉主义。美国为使其称霸世界的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大力兜售和推行“新干涉主义”，其理论依据是“人权高于主权”“人道干涉无国界”等等。按照这些理论，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发生美国认为“不民主”“不人道”的事件，美国就有权或干预、或谴责、或制裁，甚至动用武力，从而为干涉别国内政提供借口。

第四，以“巧实力”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奥巴马上任之初，美国面临空前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金融危机暴露美式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师出无名、失道寡助，低落的国际形象严重削弱美国的全球号召力。奥巴马为此提出新的对外战略思想，其突出内容就是“巧实力”外交，也就是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刚柔并济，左右逢源，平衡软硬两种实力，积极笼络新老盟友，有效统合多重目标，灵活应对不同挑战。奥巴马还改变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放低身段，强调对话和倾听，以扭转美国国际形象日益下滑的趋势。

2. 少数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呈现为“一超多强”。在西方世界，除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力图称霸世界和推行强权政治外，西欧一些国家也在推行强权政治。它们以西方的价值观念评天下，论是非，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恣意干涉别国内政。

北约成立于1949年4月,由美、加以及西欧的英、法、意等16个成员国组成,目的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西进。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华约的解体,北约已无存在的理由,本应解散。但实际情况是,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实现了扩大和强化,目前成员国数量已经扩大至28个。1999年4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21世纪北约“全球化”的战略新概念。其核心是:(1)北约可以在其成员国以外地区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从原来的领土防御,扩大到处理地区危机和强制维和,其中包括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活动、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等一切涉及北约盟国“共同利益”的事件。(2)北约的军事干预行动无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实际上就是这一战略概念的试验场和试金石。在北约成员国中,西欧国家成员占大多数,这些国家通过北约损害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并使强权政治变本加厉,成为世界不安定的重要根源。

二、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变革方向

(一) 关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各种主张

冷战结束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世界主要力量提出的主张不尽相同。

美国的“秩序观”。美国谋求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实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1990年9月11日,布什总统就海湾危机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时,提出建立“世界秩序”的主张。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阐述了“世界秩序”蓝图。克林顿执政期间,对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实力进行了重新评估,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主张利用冷战后美国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小布什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色彩日渐浓厚,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对所谓一切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和国际规则统统拒绝,甚至要用武力实现“自由秩序”^①。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多伙伴世界”构想,有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与以敌我划线的简单做法,

^① 赵庆寺、黄虚峰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强调美国愿与不同类型的国家一道共同应对挑战，建立一个美国主导、大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①

尽管美国国内对于“世界秩序”的表述有所不同，历届政府的做法也存在差异，但基本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就是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领导世界。具体而言，美国主张的“世界秩序”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发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为此，美国要在国际事务中起“带头作用”，在西方世界起“核心作用”，对盟国安全起“保护作用”。第二，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大力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第三，对盟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并让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美国在财力、物力和舆论上不致陷入被动。第四，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体系，消除危及美国利益的各种威胁，有效地借助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

西欧国家的“秩序观”。欧洲发达国家在建立新秩序方面看法不尽一致，但有许多共同点：第一，各国都主张把自由、民主、多党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西方价值观作为未来世界秩序采纳的普遍原则，这一点与美国的主张类似；第二，欧洲不仅要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发挥“力量中心”的作用，而且要成为世界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力量。欧盟国家要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在国际秩序中分担领导责任；第三，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建立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法国、德国等明确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动武。在欧洲大国中，英国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美英特殊关系使其外交政策带有追随美国的浓厚色彩。但英国保持与美密切关系的目标是借助美国的国际影响，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在谋求共同主导国际秩序、在新秩序中分享领导权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德国的主张是一致的。

欧洲国家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面临众多困难。一是欧洲一体化动力不足。从历史上看，促进欧洲走上一体化道路最为关键的是安全因素。随着冷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9/2010》，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

战结束,欧洲的传统安全威胁大为降低,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政治一体化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这让欧洲在国际舞台上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甚至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内部分歧、矛盾不断。二是欧洲经济实力呈下滑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经济在全球化竞争冲击下,平均年增长率不足2%。尤其是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不得不将很大精力用于解决内部经济问题,无暇顾及国际秩序问题。三是欧洲的主张与美国存在矛盾。总体上看,西欧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拉大,欧洲欲分享美国的领导权着实有些力不从心。

日本的“秩序观”。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多年来的外交基调都是顺应现存国际秩序,谋求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日本越来越不甘愿长期处于“小伙伴”地位,将实现政治大国作为国家发展目标。1991年2月,首相海部俊树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一改传统的外交基调,强调日本要“积极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将其作为施政的首要目标。此后日本内阁虽然更迭频繁,但都将实现政治大国作为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二度出任首相以来,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

日本“世界新秩序”构想的核心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不应由美国一极主导,西方大国应该是建立新秩序的“共同力量”。日本政界要人多次强调,冷战后的世界正向多元化发展,主张建立以美、欧、日对话与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日本应作为支撑国际秩序的一极而发挥作用。日本迫切希望实现国际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彻底摆脱战败国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大国地位。为此,一方面加快发展军事力量,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突破海外派兵限制,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着力点放在亚太地区,争取亚太秩序的主导权。

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日本与西欧在价值观念、制度等实质性问题上有共同点,都是要建立西方大国主导的,以西方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秩序,明确反对美国独霸世界,要求在新国际秩序中分享领导权。

发展中国家的“秩序观”。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怀有改变国际旧秩序的强烈愿望。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亚非国家便在万隆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决议与宣言,确定了各国和平

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60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但是国际旧秩序严重阻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77国集团发表联合宣言,表达了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国际旧秩序的心声。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概念。1974年4月,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在77国集团的推动下,专门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纲领。

美苏两极格局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主要内容包括: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分工;改变世界经济中不合理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格局,保证发展中国家能够掌控自身资源的开发;加强南南合作,特别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同时积极参加南北合作;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①

(二)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变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1. 变革的动力。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经济陷于低迷,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预计到2020年,国际经济版图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的局面。从国际贸易角度看,1994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对外贸易总额仅有0.32万亿美元,在国际贸易总额的占比5.12%;到2011年,“金砖五国”的外贸总额已经达到了3.62万亿美元,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升至14.53%,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人口猛增,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

^① 俞国斌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数量增长快,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在危机前几乎完全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力开始显现。与此同时,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带来格局变化,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之势凸显。据经合组织(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和欧洲的1.5%。^①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与西方国家的“集体性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是二战结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格局变化,势必推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大变革。

2. 变革的阻力。

首先是发达国家利用现存的实力优势,竭力阻挠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变革。发达国家近年来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战后长期形成的优势存量依然很大,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制定者、得益者和维护者,绝不会轻言放弃,他们正在顽固地抵制和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主张和要求,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不肯做让步和妥协。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花样翻新地提出一些所谓的新理论、新主张,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维持旧秩序的本质。

其次,发展中国家实力虽然普遍上升,但尚未形成合力。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但发展中国家数量多,分布广,发展阶段不同,各国国情复杂,不易拧成一股绳。2011年IMF总裁选举被认为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一次权力角逐,在选举过程中,美欧铁板一块,新兴经济体则各有考虑。“金砖五国”虽然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欧洲人继续把持IMF总裁职位,但各有自己推荐的候选人。相比之下,美国虽然未公开支持拉加德,但仍然延续了“欧洲人担任IMF总裁、美国人当世界银行行长”这一战后几十年的“默契”,最终使拉加德顺利当选。美欧的优势不仅在于其经济规模和实力,更在于有深度利益捆绑,而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交织远不如美欧紧密。从地缘政治上看,这些国家要么相隔万里,要么虽是近邻却存在竞争关系,想要达到“美欧式的团结”并不容易。

^① 陈凤英:《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载《领导文萃》2011年4月,第14页。

3. 制度惯性问题。

制度一旦形成,制度的参与方就会形成“路径依赖”,进而维持这种制度的存在,让制度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当前,伴随新兴国家崛起以及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国际体系确实处于转变之中,但与以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转变不同的是,此次崛起国家面临着的是一个比较成型的国际秩序,这一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体系都要成熟、完整,对崛起中国家的行为构成了强大制约。由于这一秩序的存在,新兴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融入现存秩序还是游离之外的选择。由于这套秩序已经比较完整,且吸纳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身在其外则会被边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国家要另起炉灶,建立新制度,代价十分昂贵。^①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接受这些规则,尽管这些规则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这样的选择,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这套秩序维持存在,为进一步变革增添了难度。

(三) 未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发展方向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人类的呼唤。同时应当看到,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观点、立场不一,发达国家定会竭力阻挠。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秩序将在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中前行,总体上保持延续性,但也将呈现新变化新气象,将在现有基础上有所进步。

国际金融机构逐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二战后维持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运转的两大支柱,当时由于美欧在经济实力上享有绝对优势,因而得以主导两个机构的运转。从二战后到现在,国际经济版图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加速崛起,其他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滑,突显出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已与客观现实严重脱节。

在IMF和世界银行中拥有份额的多少,决定了成员国的权益大小。对IMF来说,少数发达国家一直在份额和投票权上占主导地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发达国家拥有60%以上的份额,其中约45%的份额集

^① [美]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著:《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王展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中于七国集团,美国一家就独占17%的份额。由于IMF的决策一般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通过,因此发达国家足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常决策,而美国更是事实上拥有对基金组织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①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这一决策机制显然需要修正。2010年10月23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宣布,IMF将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欧洲国家还将放弃两个执行董事席位。^②

世界银行方面也是如此。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其中美国的投票权减少1.15个百分点,从17%降为15.85%;日本的投票权减少1.98个百分点,从8.82%降为6.84%;中国的投票权则增加1.65个百分点,从2.77%上升为4.42%。^③

二十国集团地位凸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八国集团(前身是七国集团)一直是重大国际经济事务的协商平台,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重要决策之外。随着实力以及影响力的变化,八国集团已经难以像过去一样垄断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决策,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并成为全球经济协调的主要平台。

二十国集团于20世纪末成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解决国际金融问题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参与。1999年9月,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建立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就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二十国集团成立后,召开会议的最高级别仅为部长级,并未引起过多关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迅速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

2008年至2014年,二十国集团举行了九次峰会,讨论的议题越来越广泛,已不仅局限于金融危机的预防与解决,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国际

① 葛华勇:《IMF改革不容缓》,载《财经》杂志,2009年第7期。

② 美国迟迟未予批准这一方案。4年过去了,各国达成的共识竟因美国的阻挠而成了“儿戏”。

③ 杨圣明:《国际经济秩序治理体制改革问题》,载《财贸经济》,2011年第6期。

发展援助、打击金融犯罪、加强金融部门的制度建设、人口与经济发展、地区一体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气候变化、反腐败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二十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平台，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结果之一，也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上升的具体体现。

金砖国家影响力上升。二十国集团虽然凸显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和地位，但毕竟西方国家所占分量较大，美欧仍然掌控大部分话语权，是西方国家在经济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不得已借助的平台。新兴经济体应当并且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这就是“金砖国家”峰会。“金砖国家”最初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为这四个国家英文首字母组成的“BRIC”一词，其发音与英文的“砖块”非常相似，所以被汉译为“金砖四国”。2010年12月，“金砖四国”同意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形成“金砖五国”（BRICS），或者说是“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26%，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总量的20%，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5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实力与潜力不容低估。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及其实质合作成果引人关注。2014年7月15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美元依然处于霸权地位。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巨大，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与会方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期内难以动摇，但从长期看，